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性的终结/[英]麦克因斯著;黄菡,周丽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1

书名原文:The End of Masculinity

ISBN 7-214-03089-6

I. 男... II. ①麦...②黄...③周... III. 男女平等 IV. D4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053 号

The End of Masculinity

Copyright © 1998 by John MacInne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01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pe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1999-026 号

- 书 名 男性的终结
著 者 [英] 约翰·麦克因斯
译 者 黄 菡 周丽华
责任编辑 张惠玲 刘沁秋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连云港海师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75 插页 2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089-6/D·488
定 价 1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终结者译丛序

周 宪 许 钧

凡事总有始终。过程被淡忘乃是常有的事，但始与终倒总是印象深刻。道理很简单，在时间的生存体验中，段落和节奏必显出过程始终。所谓起始者，指事之不必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发生者；所谓终结者，乃事之上承某事而下无他事其后者。亚里士多德如是说。

太阳升起落下，海水涨潮落潮，生命诞生死亡，王朝更替兴衰……旧的终结意味着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又必脱胎于旧的终结。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此乃生活世界之真谛。因为没有起始与终结，世界便凝固不动了，生命便归于永恒的沉寂。

新千年的到来，别有一番意蕴。虽说这不过是时间长河中一个平平常常的点，但在纪年的意义上，却带有某种深层的历史感。惟此开启了新，所以也就终结了旧。

然则，终结感并非千年逝去的关口方才出现。60年代以后，“转向”一词在西方学界颇为流行。罗蒂“语言的转向”一语既出，种种“转向”纷至沓来，诸如“解释的转向”、“文化的转向”、“批判的转向”、“视觉的转向”等等。究其“转向”义，大有宣判终结之嫌。与“转向”一词同时出现的是各种“后……”的标识，所谓“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后福特主义”、“后信息时代”、“后启蒙时代”等等，莫衷一是。何谓“后”？不就是标志着“上承某事而下无他事其后者”吗？从“转向”到“后……”，必然引出“终结”，诸种“终结”的理论一时热闹起来，什么“历史的终结”、

“主体的终结”、“艺术的终结”……仔细琢磨，西方知识界热衷于命名各种“转向”、“后……”和“终结”，看来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反观种种“终结”图景，社会发展变迁的脉络赫然眼前。所以说，谈论“终结”，不啻于奠基新起点。

基于此一理念，本丛书聚集于西方学界晚近热门的种种“终结说”，从哲学、社会、艺术、教育、性别观念、生产方式等诸多层面，揭橥当代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种种激变。虽然这些著述的基本主题同是“终结”，但各方写家观点纷然杂陈，不仅所涉论题千差万别，而且所持观念立场亦大相径庭。激进观念有之，保守学说有之，兼而有之者亦不乏其人。进一步，在不同见解和陈述中，我们又不难瞥见其中某些“终结”之历史的和逻辑的关联。诚然，方家诸说未必总是在理，也未必合乎中国国情，但不过兼听则明。虚心聆听各路人士的高头讲章，或许有助于开启我们的深入思考。

英伦小说家福斯特有小说名曰《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此书名颇有趣：“房间”本无“风景”，只有位置和朝向；然则，位置和朝向差异，所见景观异趣迥然。“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当视野宏阔，奇观异景尽收眼底。说实话，我们选编这套丛书的初衷，便是为有兴趣的读者打造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吁请各位看官步入其内，以各自好奇而探索的目光，去打量那种种不同的“终结”景观。

至于说，所选篇什到底藏着什么“风景”，这答案只能留待睿智的读者去追寻了。

谨序。

2001年6月于古城南京

目 录

前言和致谢	1
第一章 男性气质的起源	1
第二章 性别差异崇拜及其秘密	35
第三章 男性气质的危机与身份政治	65
第四章 性别和社会性别的悖论	85
第五章 作为社会化理论的社会性别： 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	119
第六章 父权制的崩溃和社会性别的起源： 血缘关系和女人的流通	144
第七章 霍布斯：社会契约与普遍主义的兴起	161
第八章 为什么个体的东西不是政治的	193
索 引	224
后 记	241

前言和致谢

唐纳德·温尼科特曾在某处说过：对他人信任的过分强烈的需要，是癫狂的一个明确信号。对那些耐心地对待我的需要——试图说服他们（因而说服自己）相信我在这里提出的观点——的朋友和同事而言，我写作此书最后几年大概使他们相信了，这种说法真是至理名言。我感谢他们的忍耐。温尼科特还认为，判断个体的心理健康的最好途径是观察他们是否令你烦恼。为了对我有利，你会觉得这本书很有趣。

V·杜因达姆、P·汤普逊、T·范德莱、R·帕尔、J·格什尼、J·霍姆伍德、B·格雷伯曼、C·沃霍特、J·奥雷莱、P·斯凯德摩、B·弗勒、J·弗勒、H·贝尔奥夫、S·耶得勒、J·沃比、D·摩根，他们都阅读并评论过初稿的不同部分。如同爱丁堡大学选修男性气质社会学的本科生和社会性别研究课程的研究生一样，在诺丁汉、布达佩斯、爱丁堡、格拉斯哥、谢菲尔德等地的大学和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所举办的研讨会中，参与者们都给了我宝贵的回馈。我在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的全体同仁，创造了一种充满智慧的激荡和感人的激励的工作氛围。我的伙伴群体——苏格兰格式塔基金的培训者和培训对象们告诉我，回避在他人面前的独处能力会使我们是怎样被制造出神经质；B·安德森、H·考特纳、D·黑尔、T·麦克维、F·米德

尔斯、M·皮兹曼特、R·普瑞查德、R·瑞奇、M·塞得勒、E·谢尔、J·斯蒂勒、E·斯潘斯、D·塞森、B·尤特黑尔、K·艾得恩得教导我：仔细观察，学会分析，整体把握，并且懂得在哪里止步；S·麦克莱兰则提醒我选择父权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

最后，还有七个耀眼的人物对这本书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他们，我甚至无法设想这本书的写作。我的叔叔伊恩·麦克因斯，他教会我怎样进行论辩，而且一直实践着我们之间关于社会性别的论辩。他给了我一种对政治辩论的热情，而且作为一位终身社会学家，他给了我一个如何将理想在自己的地方社区内转变为实践的范例。他还给我推荐了穆勒的《论自由》并使我信服其中的联系。J·布瑞德，最早鼓励我写作此书，并且和T·霍姆，A·斯万和S·沃肯斯这些伙伴群体的幸存者一起，首先在一种个人层次上使我信服了我在一种政治层次上为之坚持奋斗了多年的事情：作为人的男人和女人，的确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也承受了这本书所提出的社会性别观点在曲折发展中的每一次困顿，在他们的友谊中表现出无以言表的慷慨的激励和温暖。J·艾得瑞从未教导过我，但却让我看到，社会学应该是怎样的：联系，激进，强有力，但却简洁而容易接近。当来自研究评估组织和高等教育的理性化官僚机构的压力出现在不同方向上的时候，他给了我时间，在心理动力学和男性气质的文献中沉浸了一年，这使我得以开始我的整个研究计划。最后，这本书还欠了一笔巨大的智慧债：在每一章中，都能感到I·克莱卜深刻的、有批判性的、活跃的工作。

设若我是在追求逾越常规的争论，那么我要说，这本书努力为女性主义者反抗男女不平等的斗争，以及正确认识儿童的需要做出贡献。设若良好的愿望铺就的是地狱之路，那么本书

做得是否成功要由读者来判断。如果它做到了,荣耀更多地属于我在这里致谢的人们;如果它没做到,责任在我。

最多的感谢给予对下述版权资料引用的许可:劳伦斯波林格有限公司,弗瑞迪·劳伦斯·瑞委莱集团和美国企鹅出版公司的海盗企鹅分公司,D·H·劳伦斯的《我所关注的女人》,出自《D·H·劳伦斯诗全集》,V·德·奥勒彼吐和F·W·罗伯茨编辑,1964和1971年版权归安吉拉·瑞委莱和C·M·魏克萊——弗瑞迪·劳伦斯·瑞委莱集团的执行官,弗伯和弗伯有限公司,以及法拉斯·特劳斯和基瑞克斯有限公司所有。“这是诗”,出自P·拉康的《高高的窗户》,1974年版权归P·拉康所有。

约翰·麦克因斯

1997年9月

第一章 男性气质的起源

欧洲的眼睛总是盯着大事，
王朝的命运和王位的崩落；
治国的庸医炮制着各自的花样，
连孩童都咿呀着男人的权利；
在这巨大的喧嚣中，让我提一句，
女人的权利，同样值得关注。

1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
“女性的权利”，1792）

如果男人生来是自由的，那么女人怎么就生来是受奴役的呢？

（玛丽·阿斯泰尔[Mary Astell]，
《关于婚姻的一些思考》，1730）^①

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和社会性别身份

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她的《第二性》（1972:15）中曾说到，“一个男人永远不会打算写一本关于男性的特殊处境的书。”然而，半个世纪过后，似乎每个男人和他的狗

都在写一本关于男性气质*的著作。为什么如此多的人在做这件事？为什么不是别的事呢？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现代性系统地瓦解了父权制（男人凭借他们的性别及与他人的血缘关系而确立的男人的统治），其结果是，实质性的变化已经发生在劳动的性别分工上，尤其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这里，我指的是这样一个进程：男人与女人基于性别而按部就班地从事不同的活动，充任不同的社会角色，接受不同的物质报酬，获得相差悬殊的权力和地位。男人们已经失去了他们对女人的大量权力，因而对这个进程已经变得格外敏感。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也是“性别”之一种，并开始对此加以讨论和争辩。通常这更多地出自对女性主义者的挑战的一种反应，而非他们主动发起，他们的书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写就的。^②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性别”以及男性气质、女性气质这类术语是现代性的一种意识形态，人们使用这种意识形态可以帮助自己想象那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男女之间基于性别的差异的存在，尽管在其他场合他们又会否认这种存在。我认为，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会更好地理解这种进程。这种想象有助于个体去理解一个据说男女之间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的社会，它也可以为个体提供一些重要的心理防卫，以抵御对现代性的恐惧，亦即我下面称为“心理不安全”的东西。这是一个所谓“本真性虚构”的更为一般的运动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想象和这种虚构，连同劳动本身的性别分工一起，总是服从于由现代性引导着的社会关系的不断变革，因此人们

* 本书用以描述性别二元划分的术语很多，译者使用的译法如下：man（男人）/ woman（女人），male（男性）/ female（女性），masculine（男子气）/ feminine（女子气），masculinity（男性气质）/ femininity（女性气质），maleness（男性态）。——译者注

也总是被迫朝向一个他们试图抵制但却无法逃避的结论：性别，在男人或女人确实具有的身份或社会特征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

大多数关于男性气质的讨论，都假设它是一个身份的经验存在形式，然后去分析它的压迫和剥削的特征，指出它怎样源于或复制了父权制，要么提出男人们可能拥戴的男性气质的替代模式，要么力劝人们彻底拒绝它。但这使我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种我们现在视为男性气质的东西最初是用来维护父权制的合理性的，它展示了男人比女人能怎样更好地行使公共权力。然而这本书的核心论题是：作为个体的财富、特征品质及身份特征的男性气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定义一种或若干种男性气质的努力注定毫无结果，并且同时意味着，以这种意义上的男性气质的概念去解释现在世界上的男女差异——男性是如何获得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地位的——恐怕同样毫无裨益。我将论证，男性气质仅仅作为各种意识形态及幻想而存在，即关于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它有助于男人和女人去理解他们的生活。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些劝导男人怎样改变自己的男性气质以支持性别平等斗争的争论便毫无意义了——因为男人怎么能去变革并不存在的东西呢？基于此，在本书中，我将不会试图去定义男性气质的不同形式，也不会追寻这些不同形式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历史关系。显然，我认为社会性别理论中流行的许多关于男人权力的解释，的确依赖于使用这种意义上的男性气质的概念，在这种使用中，身份直接化约为意识形态，个人直接化约为政治，结果创造出一个“过度社会化”的男人与女人的模式。性别应该被看成关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的具体斗争的意识形态的结果，相反，想象性别身份引起了劳动的

性别分工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它最终表达的是男权主义意识形态所采用的现代形式。我还将依次论证,这种意识形态建立在将性别起源与性别差异的系统混淆上,建立在对我们生为男和女与身为男或女的混淆上。

男性气质和现代性

丢掉定义男性气质的念头,我想问一个更为根本、同时我希望也更有启发性的问题:是什么历史条件促使人们最初想到了用男性气质之类的东西去理解他们的生活呢?我认为,市场关系的广泛扩散的一个最意味深长及不期而至的后果便是,对人人平等这一原则的正式承诺在现代社会中的兴起,而且社会和物质的压力也支持着这种被称为普遍主义的原则。现代性创造了迅疾变迁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它将父权制时代产生的劳动的性别分工的物质与意识形态的遗产,与瓦解这种遗产、创造性别平等秩序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力量结合在了一起,这种迅疾变迁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矛盾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创造了性别这种崇拜的意识形态。^③

显然,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从封建或传统社会变迁的性质均不属本书的讨论范围,但把三个相互联系的发展作为无庸争辩的前提接受下来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是市场和交换的发展,它鼓励人们以财富的私人形式——商品——来进行思考,把自己看成是各种财产的所有者,包括他们的能力也是他们的财产。另一个发展是启蒙运动及理性化进程,在这里,逻辑、计算、科学探索以及经验证据被看成不仅是理解自然而且是理解社会的最重要的方法。例如霍布斯,他的研究开始于几何学,非常熟悉伽利略,同时他也将自己视为人体运动科学的先行者。最后

地被消蚀,也就是马克思曾说过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断革命。

科层制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地位的均等,这已经表现为一个历史的正常趋势。反过来,社会均等的发展通过排除依靠身份地位特权获得晋升的方法,又为科层制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客观履行公务首先意味着依据可计算的规章而“不考虑人”,“不考虑人”同样也是“市场”以及所有惟利是图者的格言。

(韦伯,1978a:215,226)

这个进程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的办公室的范围,我们可以将办公室用做遍及生活各个领域的社会角色及功能的同义语。韦伯未能清晰预见的,也是我在本书中将要论及的一个观点:即科层制及市场的非人格化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地位的均等化的一个部分,便是性别地位的均等化。“不考虑人”发展到最后,自然也不考虑那些掌控市场和占据了办公室的人的性别,因为性别与人的能力毫无关系。

理性化把社会关系从传统的巫术、迷信和宗教信仰的教条中解放了出来,然而,根据韦伯的说法,它的一个未可预料但却无法回避的结果是:个体生活日益屈从于来自公共领域的压力,无论他是科层制的成员,或是被要求忠诚于国家的公民,还是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他们的运作方式都超出了他们的自我控制。一个被鲍曼(Bauman)(1991)称为“道德无形”的问题。办公室的官僚们可以无视伦理后果而只醉心于解决问题的技术手段,他们无须对最后的结果负有责任。实际上正是因为系统的效率建立在非人格化的基础上,官员们对“最终结果”的任何想法都

很难产生影响。对官员的要求取决于“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作为该官员的个人的观点。因此，在科层制或市场形式的理性化与其最终结果的理性化之间，并不一定要有固定的因果联系。也因此，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的令人称奇的物质进步的另一面则是大屠杀和核武器：毁灭性手段的理性化。

第二个问题是，科层制和市场的技术效率会颠覆其自身最初的追求目标，并统驭全部的社会生活。所以，由于大量相互联系和竞争的市场和科层组织采取了无数短期行为策略，社会的总体方向有可能因此变得不可把握和不可预料。韦伯因此将科层制称为“铁笼”（1930:181），并认为现代社会的科层制会比奴隶主的统治更强有力。

沿着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我们可以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归纳于办公室的规章而不是人的崛起。这个结论在两个意义上是真实的。首先，是规章统治人，而不是其他，与此同时，男人们也更少能够凭借“性别”而占据更有潜力或报酬更优厚的位置。他们必须开始同女人竞争，在能力的基础上去获得社会角色。因此，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似乎是那种促进性别平等的力量的崛起，但它同时也使男人和女人侧身于市场的抽象规则和科层制的“铁笼”中，这个悖论将巩固本书其他部分的论点，我将在第八章中详尽阐述。

现代性的实质是在完成这样一种认识：人们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身居其中的整个社会都是人们自己的创造，不管是清醒或糊涂，有意或无意，因此他们要独自地或集体地对这种创造负责——吉登斯（Giddens）称为“反思性”。布莱希特（Brecht）在《伽利略的一生》中抓住了理性化与解魅过程中的这一关键特征，他设想了这位天文学家与他的年轻学生之间的谈话（布莱希特，1980:6-8）：

2000 年以来,人们一直相信太阳和星辰都是围绕人类旋转的。教皇、红衣主教、王子、教授、船长、商人、渔夫和学童,他们都以为自己是静止地坐在这个水晶球里。然而现在,我们正在全速突围。安德里亚,因为旧时代已经结束,新时代正在来临。地球正在围绕着太阳快乐地旋转,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渔夫、商人、王子、红衣主教甚至教皇也都概莫能外。

宇宙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中心,一觉醒来,我们发现它有无数的中心。因此,每一个人都可被看做是一个中心,或者都不是中心。空间陡然变得无限宽阔。

表述这种新反思性的一种通常方式(使用它时可以继续对上帝和圣经表示虔诚和应有的尊敬,这是该方式的优点),是将社会作为人们彼此之间达成的一系列清晰或不清晰的契约来思考,它将这个社会的实质定义为:人们在其中可以自由达成他们意欲达成的任何契约,而这与那种人们只能经由其血缘而继承或被先赋予一个固定社会地位的早期社会是截然相反的。它导致了这样的观念:人与自己有一种明确的契约,作为一种财产,他们完全拥有自己,并对自己实施控制,比如他们可以将自己借或租予他人。

举一个雇佣契约的例子,在这里,被雇佣者与其说是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老板或老板的权威,倒不如说他们是将此交给了自己的选择,因为从理论上说,他们可以自由谈判,采取一种可以最佳利用自己能力的方式。薪酬劳动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尽管在实质上有如马克思、韦伯和其他人所质疑的:对无产者而言,它可能意味着比以往更具有强制性的奴役。像构建了一种

平等的社会关系一样,契约也很容易成为再生产传自身份社会的附庸与不平等关系的发动机。社会契约的统治的确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无限制的自由和许可,一种多元放任的政治形态。因此,马克思可以对此批判说:在劳动市场自由和平等交换的表象下,掩盖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它意味着通过所有者对生产手段的垄断,劳动力的购买者依据交换方式享有系统性的优势。就像我们会看到佩特曼(Pateman,1988)用同样的分析方式指出,一般的社会都预先为原始的强奸设置了“性交换”的方式,这种社会契约的背后,则是暗藏着的创造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个体的性别契约。因此,契约能够产生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同时也产生了达成契约的团体所难以预见的结果。

社会契约理论家们致力于探索契约的社会先决条件,那种表现为信任的问题,它们使个体首先能够自由地签订契约,同时又避免了内部失序或无政府主义。如果社会秩序不是自然和神性法则的产物,那么构成秩序基础的压制和制衡就应该通过人来理解,因为人是自己的主人。无视秩序的运转则会招致危险:秩序失灵的麻烦换来秩序崩溃的更大苦难,直至崩溃为蒙昧状态或无政府状态。^⑤因此,只有当人们懂得了政治,他们才能够回避那种父权主义者或保皇主义者所谓的无可回避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他们可以试图建立一种社会,其管理和服从均基于明确给定的承诺,而非想象中的自然或超自然的控制规则。霍布斯明确阐述了对政治极权的服从通过建设社会的可能而自相矛盾地增加了人们的自由。人们将对彼此的恐惧(或者对上帝的恐惧)换成了对主权国家的恐惧。弗洛伊德后期有关性并非是简单的自然定义的观点,在霍布斯和他人关于人并非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观点的相互补充中,变得更加可靠。像霍布斯一样,弗洛伊德将性秩序视为社会权力契约,它通过对人的行为加

- 7 以限制(乱伦禁忌)和对人必须面对的有限而无奈的选择的论证(俄底浦斯情结)而使文明变得可能。

迄今为止,所有历史上有据可寻的社会,无不具备劳动的性别分工的特征,其合法性有赖于对男女角色的天赋或神授的想象。这种性别分工虽然形式繁多,但它总给男性以系统性的特权,他们特别享有比女人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并通过宣称男人凭借其性别而自然优于女人来维护其合法性。这可能是父权制或男性的性别权力惟一相通的涵义,它以父亲的统治为表现形式。佩特曼认为(1988:20),女性主义范围里的父权制提法一直存在着争论,因为将所有男人都实践着的凭借性别而拥有的政治权力模式独立出来是很困难的,而放弃这一努力又意味着“女性主义者的政治理论将会失去特指女人从属地位的惟一核心”。有关父权制的这种争论可以被下述认识所化解: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面对的不再是父权制本身,而是它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遗产,反过来,这种遗产又被现代性的主要社会关系系统地瓦解了。

因为继承了父权制时代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遗产,现代性给男人(和女人)带来了理性化的新问题,并且不再借助“男女的自然差异给男人统治女人的自然权力”这种直白的父权制观点来解释男性的系统性优势。男性气质的概念(及与此相关的性别和女性气质的概念)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在前现代的父权制环境中被定义为自然决定的男女差异(性别的结果),现在被认为是社会的产物——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社会性别的结果)。假如视性别为劳动的社会性别分工的根源,那么这种分工就可以理解为适用于现代普遍主义社会的社会契约(性别身份在社会化的男女中对照的结果)。抛开性别,劳动的性别分工必须证明父权制是社会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男女的自然差异